

历时 44 天的农村调查，带着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回到北京后，立即对“大跃进”的失败作出深刻的检讨，从而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

特别是 1961 年 5 月 21 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那一篇著名的讲话，观点鲜明尖锐，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获得了与会人员大多数的赞同和接受。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笏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湖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对于成绩和问题，有的同志讲，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难道都是老天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刘少奇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道出真相，对中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这些话语令毛泽东十分不悦。在当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已退到谷底，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

到了 1962 年 1 月 11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冷静分析当前形势，深刻总结四年来的工作及经验教训，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会上刘少奇作了即席讲话，在分析关于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时，刘少奇又重提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意思，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怎样评价“三面红旗”时，刘少奇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毛泽东似乎始终没有发表同意刘少奇的这些观点的讲话；相反地，却在不同的场合以“错误就那么一点点”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开始上升”进行反击。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与整个会议的反“左”基调是相左的。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三)1964年，由于毛泽东的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全国城乡开展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厉害刘少奇被毛泽东委任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也就是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更加白热化了。

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认识和看待运动的性质及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问题上。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一直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

顶在他们头上。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呀？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刘少奇讲，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毛泽东进而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泽东还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术语。

刘少奇明显地不同意毛泽东的“走资派”的提法。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为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因而他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可毛泽东仍坚持与强调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刘少奇再一次说，还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后来语气更加坚定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作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早在1964年5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随着“左”倾认识的发展，他越来越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多次同外国党领导人谈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党内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人，多次给地方领导谈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次对中央的一些部门提出批评，还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这次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最后否定了以刘少奇为主制定的《十七条》，而

通过了按毛泽东意见起草的《二十三条》。确认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重点指向了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人。

毛泽东、刘少奇听取刘亚楼报告

(四)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毛泽东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考虑。它的理论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不少领导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起初，毛泽东并没有亲自领导这场大革命，他远离北京前往南方的杭州、长沙、武汉等地巡视。因此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初期只能由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顶着和领导。当然，毛泽东也并非不知悉北京的情况，他密切地注视着北京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情报流向到毛泽东那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就时常向毛泽东汇报。比如，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后炮制出来的，发表前并没有经主持一线工作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审阅、同意。又比如，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就是由康生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并作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而刘少奇是6月2日下午才从报纸上看到大字报的。这一系列的大事，刘少奇不知道，周恩来不清楚，其他中央领导感到意外。

根据运动的需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5月29日开会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当时周恩来当场用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为慎重起见，5月30日，刘、周、邓联合致信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一事，信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的。毛泽东收到信后即批示：“同意这样做。”

标本

刘少奇还多次提出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后又数次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运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请示运动的指导方针。6月12日回到北京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派工作组在全国铺开。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仿照中央的做法，陆续地向学校和有关单位派出了工作组。

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并播出后，全国各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校的党委、领导成了斗争的目标。乱批乱斗已出现，而且迅速蔓延。领导、教授、专家、学者被揪出批斗示众。人身污辱、打人、抄家已成家常便饭。甚至自杀、打死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局面，6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布置对运动的领导。会上，刘少奇提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黑帮，运动上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各地的工作组开始反干扰，对前段的错误行为给予反击。严重者被关押。在反干扰中，个别被斗者自杀身亡。

7月18日，毛泽东结束杭州、长沙、武汉之行回到北京。刘少奇见毛泽东已是他回京后的第7天了，即7月24日。一见面，毛泽东劈头便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的大门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刘少奇感到一阵愕然。毛泽东还说，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错误。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犯了

“方向性错误”。这一天，毛泽东宣布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开幕。会上，刘少奇讲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毛泽东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刘少奇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瘫痪，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反问，怎么会中断呢？刘少奇接着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说道，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全会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中央领导机构改选，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毛泽东为第一，林彪紧随其后排第二，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跌到第八。后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公开发表。字里行间，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是直指刘少奇的。从此时起，注定刘少奇要走向灭顶之灾。这既是刘少奇个人的悲剧，也是党和国家之不幸。

毛泽东到底伟大在哪里

一、大功

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二、大师

毛主席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创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伟大革命导师和世界领袖。

三、大帅

毛主席是不畏强势、敢斗强敌、胆略超人、百战百胜、享有盛名的伟大军事统帅。

四、大家

毛主席是古今中外空前杰出的预言家、哲学家、外交家、书法家和诗人。

五、大智

毛主席是足智善谋、神机妙算、出奇制胜的大谋略家，大智慧是毛主席之所以能开辟一个中国历史新时代的最大奥秘。

六、大义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绝对忠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他先后失去了 16 位家人亲戚。

七、大爱

毛主席具有真挚博大的爱民情怀，是敬重人民、拯救人民、造福人民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

八、大度

毛主席是胸怀宽阔、与人为善、宽以待人、忍辱负重、以德报怨的当代“活菩萨”。

总而言之，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集成者，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热爱无限崇拜的伟大领袖和民族英雄，是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毛泽东的胜经——抱元、守一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又是凭什么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呢？

中国的老祖宗是非常睿智的：“抱元守一”本是道家的修炼之法，熟谙中国文化的毛泽东执马列之宏纲承中华传统文化之妙言分取抱元、守一四字深嵌于中国革命之的，纵横捭阖几十年生发成无坚不摧的要道妙诀——胜经。

“抱”是融合的意思；“元”指事物的基本，抱元即是抓住革命的根本和本质；“守”就是遵循，

“一”就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内在规律。守一即是把握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面临着第一次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长夜漫漫，路在何方？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二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积极支持农民革命；三是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走什么路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抓住了革命的根本问题。

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屋建瓴提出了与已经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分道扬镳，直接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革命：“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与南昌起义比较，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它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就使革命的成份更先进，革命的旗帜更鲜明。解决了谁举旗、举什么旗的问题，从而明确了革命的本质问题。

抓住了武装革命这一根本问题、解决了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的本质问题即“抱元”问题，尚不足以引领革命走向必然的成功。还必须正确地解决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问题即“守一”问题。

按照上级要求，秋收起义伊始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同志冷静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审时度势，确定了正确的进军方向，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的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农村进军，保留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有：缩编部队，将师缩编为团；建立党代表制，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正确道路开始形成。

井冈山会师后，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受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极端民主化等问题的影响导致了“八月失败”；又由于红军中军政关系由于两支部队的会师也出现了一些意见和分歧，“朱毛之争”和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导致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此后，陈毅回中央汇报工作，朱德率部队南下广东作战失利。

直至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由陈毅带回的“九月来信”。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认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方使“朱毛之争”划上了句号。毛泽东重回红四军就任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28—29日古田会议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案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

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从此党指挥枪的观念深入人心，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

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起点。后来针对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指明了这条正确道路的光明前景。在克服了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后，引领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中央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中央红军十万六千人，居各方面军人数之首。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胜经——抱元（抓住革命的根本和本质）、守一（把握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是革命事业成功的永恒法宝。

这一革命的胜经被重视的时候，革命事业就顺利发展；被抛弃的时候，革命就会遭遇挫折甚至失败。